

# 北京上海等八城市将率先进入3G时代

本报讯 虽然近期发放3G牌照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国移动在部分城市的TD-SCDMA网络可能在近期开始试运营。中国移动人士对记者表示,公司在8个城市的TD-SCDMA网络可能在2月底至3月初进行试运营,这意味着这8个城市的手机用户即将率先进入3G时代。

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开设了TD体验厅,向市民推广TD应用和服务,展示厅已陈列了多款TD手机产品及服务彩页,市民可以前往体验3G服务。

体验厅目前尚未开始提供3G业务,但是展厅内已经设立了

业务办理柜台及各种自动柜员机服务等。只等试运营开始,即可开始销售3G手机。消费者就可以用3G手机享受视频通话、看电视、流媒体点播、网络游戏等功能。

目前中国移动已经在北京、天津、沈阳、深圳、秦皇岛、厦门、上海和广州等8个试点城市搭建了TD网络,并进行了多次测试。

不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TD开始试运营并不代表3G牌照要同期发放。同样,TD的正式商用也需要时间,需要在上百个城市建设网络。根据规划,中国移动在TD二期建设中,将在全国上百个城市铺设TD网络。

**相关链接:**  
3G:全称为3rd Generation,中文含义是指第三代移动通信。1995年问世的第一代数字手机只能进行语音通话;1996到1997年出现的第二代数字手机增加了接收数据的功能,如接受电子邮件或网页;第三代与前两代的主要区别是在传输声音和数据的速度上的提升,它能够处理图像、音乐、视频流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

TD-SCDMA:中文含义为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接入,属于一种无线通信的技术标准。

据《东方早报》

# 重庆一农民工储蓄所前举牌警示市民“我取了5000元,全是假的!”

本报讯 “你们不要在这里取钱了,我取了5000元,全是假的!”18日中午,在重庆观音桥步行街邮政储蓄门前,一男子高举牌子,声称自己17日在该储蓄所ATM机上取出了整整5000元假币!

## 取款半小时发现不对劲

18日中午1时许,两名男子和一名妇女来到储蓄所门前,高举一个写有“我在这里取到假钱”的牌子。举牌子的男子叫汪登渝,长寿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汪说:“我昨天中午在这取了5000元准备借给小舅子,半小时后我们走到家乐福后发现钱是假的。”不过,对于汪登

渝半小时内的行程,只有其小舅子能够作证。

## 48张百元钞票同一号

汪和他的小舅子发现这些钱有问题后,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观音桥商圈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

“这些钱的确是假的,其中有48张百元钞票是同一个号码,非常新!”民警说,另外两张虽不同号,但经过鉴定也是假币。“随后我们到储蓄所调取了监控录像,看到了汪登渝的取款视频,他确实取了钱,但因看不清这些钱的号码,所以现在还无法断定。”

## 储蓄所否认作假

对于汪声称取到了5000元假币一事,该储蓄所一徐姓女负责人断然否定。“自动取款机内的现金不可能存在假币!”徐女士说,这个程序共有3个人参与,两名工作人员将现金从验钞机上清点后,装入取款机内的保险箱中,然后由保安封存再放入取款机内,这些过程全程监控,不可能作假。

民警事后调取装钱的录像未发现异常。另外,按照相关规定,自动取款机内现金都是七成新,不准换新币。

5000元假币从何而来,江北区警方目前正在全力调查。据《重庆时报》

# 北大校园老子雕像断十指

本报讯 “教学楼前原本完好无损的老子雕像十根手指居然全断了!”18日是北大开学的第一天,许多同学都发现,老子的雕像出现新的破损。

18日下午记者来到北大校园内,在第三教学楼前见到了这尊“断指老子”的雕像。2米高的大理石雕像让人感觉威严尊贵,可主人公置于胸前的残缺双手却显得格外突兀。记者发现,不少游人经过此处时,都发现了雕像的异样,

有的游客还以为这是独特的造型创意,纷纷摸着老子的断手合影留念。一名4岁的小男孩见状高声对父亲说:“原来老子是残疾人呀!”

据介绍,这尊雕像是北大100周年校庆时哲学系校友送给母校的礼物,不远千里从南方运送过来,很是珍贵。

“雕像后面就是奥运会的乒乓球馆,到时候游人更多,这样的雕像岂不是让世界看笑话?”一

名姓徐的同学说。

因雕像立于中国哲学暨文化培训所的大门口,记者询问研究所和第三教学楼的有关管理人员,对方均表示去年大修之前手指还健在。19日上午,记者致电负责该教学楼修葺工作的后勤基建工程部,该工程部的李部长表示,在修葺过程中,该雕像是被严格保护的,“手指原来就是这样的。”

据《北京晚报》

# 新婚女子攒半月脏衣带回娘家让妈妈手洗

本报讯 18日,家住江苏省建湖县城阳光水城小区的吴女士听说半月前举行婚礼的女儿女婿要来娘家看望,就满心欢喜的早早地到菜市场买好了菜等候着,上午10点,女儿女婿从盐城赶到建湖,小两口手上拎着的除了一些水果类礼品,还有三个大包裹,吴女士刚想责怪女儿小方(化名)不该花钱买这么多东西带来,不想女儿忽地关上门向妈妈撒起嘴发话,是半个月来积攒下来的换洗衣服,是半个月来积攒下来的换洗衣服,这次想请妈妈帮忙洗再让她带回婆家。

女儿的这个要求让做妈妈的哭笑不得,她知道自己这个23岁的独生女儿一直娇生惯养,长这么大一直依赖父母照顾她的生活,就是在外上学几年也是节假日里把换洗衣服带回家来让妈妈洗。

小方说:“如果再不让我妈突击一下,就实在没有干净衣服换身了,这些都是名牌时装,用洗衣机洗对衣服有伤害,还是妈妈洗得好。”她还笑着说:“以后要洗衣服打电话让妈妈去我婆家,也省得我花力气把衣服大老远的送过来。”

据《扬子晚报》

# 女生为当校花用压岁钱整容

本报讯 17日上午,记者在天津武警某医院整形科碰到了一名女中学生,她整容竟是为了当校花。

当天中午11时许,一名女学生被从手术室推了出来,她刚刚做完开眼裂和浓眉手术。这名女学生姓陈,18岁,读高三,高考的目标是艺术类院校。“今年夏天我就毕业了,还没评上过校花呢,大家都说我的眼睛和眉毛差点,所以这次来完善一下,争取毕业前当上一次校花,这以后也是个荣誉啊。”陈某说,这次手术她用的是自己过年得到的压岁钱。

该医院整容科主任介绍,春节黄金周一过,整容科就接到很多病人,其中中学生超过了60%。

据《城市快报》

# 老汉写诗近千首欲作万首超陆游

本报讯 长春市兰家镇文化屯59岁的邹本忠老汉从1975年至今,创作了近千首诗词,他想在有生之年创作一万首,争取超过南宋大诗人陆游。

18日上午,记者见到了今年59岁的邹本忠老汉,农民出身的他,看起来似乎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几分。邹本忠说,他没有太高的文化,只读到中学二年级。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做诗,从1975年开始写诗。“不管什么时候,即使春耕和秋

收的时候,我只要有灵感,就拿起笔来创作。”

邹本忠说,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一直本着爱好来创作诗词。而对于自己满意的作品,邹本忠想了很久,最后干脆说了一句“那太

多了”。邹本忠说,很喜欢陆游的作品,陆游一生创作了9000多首诗,他要加快创作速度,争取在有生之年创作一万首诗,超过陆游的作品数量。

据《城市晚报》



## 飞行救助受伤女童

18日,驻扎在山东蓬莱的交通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值班室接到长岛县政府求救电话,一名3岁的女童头部受伤昏迷不醒,有生命危险。飞行队立即启动紧急救助程序,B-7312救助直升机迅速起飞,仅20分钟就到达事发地点,将受伤女童救上直升机,返回蓬莱飞行救助基地,送往医院救治。

新华社发



18日,山西省长治县八义镇师庄村几位村民抬着大红“春”字花灯去参加全村元宵节社火活动,喜庆新春。

新华社发

## 时政点击

# 昆明“一纸风行”体现了什么

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为了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据报道,此事成为当天开幕的昆明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许多委员认为这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但也有委员认为,这一做法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骚扰电话,会给机关和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

政府机关以及政府官员的设置,恰恰就是为社会及公众解决“麻烦”的,自然不能害怕“麻烦”。因此那种担心因公布官员联系电话而招致负面影响的顾虑,大可不必。而且出于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即是对官员个人产生一些麻烦,也是必要的“领导成本”。何况,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专号受到抢购这种现象本身,也表明市民对公布之事的深以为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官员与民众互动的资源仍然十分稀缺的情形下,昆明的公布官员联系电话之举,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弥补与沟通。

这样一种“官”“民”互动资源匮乏的事实,是必须看到的。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卖出好价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邮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的“饥渴”表现,也是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这也表明,除了电话或信箱这种日常联络工具之外,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及

框架内,政府与民众之间仍缺乏有效互动的制度设计。

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我们有人大代表,有人代表大会制度,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有时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促进官员与民众沟通对话的功能,甚至出现了在广东省两会上人大代表尖锐发言屡遭打断的尴尬场面。我们也有不少媒体,但因为种种原因,它们也并不能完全担当起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功能。我们还有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设置,但权力至上的骄傲和衙门作风的泛滥,却造成了有门难进的局面。

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想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质疑,昆明这种过分依赖或者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向行政程序设置,假设公众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以解决,那么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的电话都无关宏旨。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沟通无碍的想象,对于通畅的对话机制的渴求。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一纸风行”所蕴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政府与民众之间这种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这也许不是公开政府官员联系电话就能承载的,但这必能进一步激活民众的想象,并以这种方式一点一滴启迪“官智”。

杨耕身

# 领导电话接通率的巨额差别说明什么

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但在工作电话公布后的首个工作日,即18日,记者们随机拨打了部分电话,除了部分忙音之外,不同领导电话的接通率存在巨额差别。

《东方早报》的记者总共拨打了5部电话,结果拨通了4部,接通率80%,不过他们拨打的对象是昆明市委书记倪和、昆明市长张祖林、昆明市委副书记杨远刚、昆明市委政法委书记海文达、昆明市委宣传部长张红革。而《重庆晨报》在上班时段总共拨打有关部门35个副局长的电话,结果仅13名副局长接听电话,接通率却只有37%。

一起公布的领导干部的

电话,同是在工作时间拨打的,为什么接通率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昆明市今后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对比接通率的差别,我们发现越是高层领导干部,电话接通率越高;越是基层干部,电话接通率越低。这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领导干部对公布工作电话的做法还没有统一认识,有的思想上接受了这种做法,有的还存在着抵触情绪;第二,不同层次的领导干部对公布工作电话的重视程度不一样,高层领导往往是下决心推动这项工作,并带头示范,而基层干部却还没有充分重视;第三,昆明市委、市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接通率的差别也

说明《通知》的执行打了折扣,政令还未完全通畅。

基层领导干部工作电话的接通率较低又说明了什么呢?除了重视程度不够之外,可能还说明两点,一是可能证实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正中歪下乱来”的传言,基层对上面文件、通知、精神的执行不力,或者应付了事;二是可能说明基层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好,不敢面对朴实的群众,“工作做到家,就不怕人骚扰”,不敢接电话,多数恐怕还是自己心虚。

昆明市委、市政府很有决心,“电话号码的公布还是政府工作作风转变的一小步,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也希望,其他地方可以向昆明学习,也来推进这项为民便民的工作。

叶雷

# 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了什么

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了什么?这是美国作家塞林格的“谜语”,谜底在文章最后,性急而未知其答案的读者朋友可以先看最后一段。

新闻说,广州开售全国首个限价房楼盘了,共推843套,统一售价每平方米6500元,结果有100多套没有卖出去(2月17日《南方都市报》)。想象中,政府发力操持的“限价房”,百姓应该是抢都来不及。还真想不到,到场选房的中签市民多达1400多位,而房子仅有843套,本身是“供不应求”,却有100多套成了“弃儿”;不是“弃儿”那也算是“鸡肋”吧,反正不抢手。蛮讽刺的是,限价房周边的某些新楼盘,将“比限价房更便宜的房子”做成了“流行广告语”。

对于保障性或准保障性的住房,没有人指望它处于黄金地段,属于黄金楼盘。然而,在开发这些住房时,主管方面有意无意地在廉价地段位置进行“开发”。广州未售出的限价房,位置、朝向较差,加上定价缺乏弹性,那“一口价”遭遇尴尬恐怕在所难免了。何况,每平方米6500元,说实在的也便宜不到哪里去。“限价”本身就很“限”得有限。

那么多套没有卖出,原因可能是多样的,甚至个体的。然而在总体上,不要将限价房弄成“局限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当“限价”的力度抵不上“局限”的现实,那么,限价房不那么受欢迎恐怕就不会是一时现象。我国各地在探索如何进一步调整住房结构,但总体上的模式是政府垄断土地、开发商垄断城市房屋供应;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保障性形式相比,探索意义的“限价房”,其局限性毕竟更大,“让利”也更有限,所以加快廉租住房保障应该算是“主旋律”。

好事要努力做好,有时就

是差那么一点“火候”,水就沸腾不起来了。比如廉租房,按说是“租”的房子,那么最好是拿到钥匙就是“可以搬进去住”的,可有的地方提供的仅仅是毛坯房,贫困的租户还得花不少钱装修一下之后才能入住,这就是不到位。有的地方一些经济适用房,盖在大老远的城市外围,便宜是便宜点,可什么配套设施都不齐全,真叫一个不方便,吸引力自然就大打折扣。

保障性住房与其他商品房搁在一起看,房子的“尊贵”“贵重”程度当然会不一样;但不同形态的房子,也应该是“平等”的,身价有不同,身份却不能分出三六九等。用通俗的比喻来说就是,保障性住房不应像卖不掉的过季衣服,成为处理商品“削价出售”。如果政府与开发商对保障性住房有着浓厚的平等意识,那么开发它时就不会“另眼看待”,而是“认真对待”。

去年底,被称为“中国房奴代言人”的厦门人吕国华,搞了一个出名的“行为艺术”,在两边30层高商品房的夹击中,弄了个像火柴盒在5平方米“豪宅”;因为工作8年有8万积蓄的他,只够在厦门岛内买5平方米的房子的,他在小屋里面住了7天,其间有逾万人参观。《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后,“5平方米豪宅”成了一个象征。如今广州的限价房当然不会有“5平方米豪宅”的局促感,但这“5平方米豪宅”可以成为一个警示意象;即使是限价房,也要弄得像样,要受百姓欢迎。

回到开头: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了什么?谜底是“墙角见”。设想两堵外表和造价都不一样的墙在墙角相见了,谁都不比谁“低人一等”,而是平等相处,那多好。这有赖于墙的内在品质本身都是坚实的,功能也一样——都能很好地遮风挡雨。

徐迅雷

# 中国看病不贵论才真是价值观不对

18日,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难不贵是中国,看病贵不贵是中国。”曾其毅直言。曾其毅认为是国人的价值观在作祟。他说:“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价值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2月19日《新快报》)

看病不难,贵不贵,底层百姓最有发言权。看病难,看病贵在高层当中亦是共识,就适时任卫生部长的高强,在全国两会上也曾深恶痛绝地说:“虚高药价简直就是对百姓的生存活剥。”

曾其毅说,国外看病是个人的,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国是全部由病人出,所以觉得看病贵。保持这种逻辑关系,不正说明在中国看病贵吗?看病贵的背后隐藏着制度因素,这是显然。基于此,就更需要进行彻底的医疗体制改革。但是,在医改尚未真正启动之际,看病难、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

曾其毅把看病难、看病贵扯到国人的价值观,是打错了靶子。请问,有谁能买得了汽车,有多少人能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而为花一百多看病觉得贵的人往往不是买得起汽车的人。同时,我们看到,即便腰缠万贯者,家道殷实者,也同样感叹看病贵,看病难,也同样凸显看病难。

在公民发言时代,谁都有说话的权利。探求曾先生的身份,就会对曾先生的言论表示基本的“理解”。曾先生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这种角色定位势必决定了他的发言具有强烈的利益集团色彩。应该说,在利益博弈时代,出现此类情况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他们必然要利用身份、利用职务维护自身利益。

学者孙立平认为,近些年来,利益已经成为扭曲改革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基本常识的现实语境下,我们所需应对的是,当一些官员利用自身力量捍卫自身利益,甚至损害公共利益,扭曲改革时,普通无发言权的公民该怎么办?

王石川